

21世紀大中華叢書

5

中國大陸 政治經濟原理

◆ 石之瑜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1
世紀大中華叢書

5

中國大陸 政治經濟原理

變遷中的
市場社會主義文化

石 之 瑜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原理

作 者／石 之 瑜

責任編輯／張 玉 蓉

校 對 者／翁 玉 燕

封面設計／林 光 樺



出 版 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7055066（代表號）

傳 真：7066100

劃 撥：0106895-3

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發 行 人／楊 榮 川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 版／申豐實業有限公司

印 刷／鴻岳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 訂／太陽製本所

中華民國 81 年 8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0533-3

基本定價 5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h-yu Shih

New Book Announcement

Looking at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Confucian-based need of Chinese leaders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the supreme moral rectifiers of the world order. Shih outlines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s cherished by the Chinese: socialism, antihegemonism, peaceful coexistence, statism, and isolationism—and explores how each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He argues, for example, that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was aimed primarily at shaming the Soviets for their betrayal of socialism; its U.S. policy demonstrates China's anti-imperialist integrity; its Japan policy blames the Japanese for a failed Asiatic brotherhood; and its Third World policy is intended to be a model for emul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has enabled Beijing always to find a moral niche in world affairs; the seeming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rinciples has been ignored, because the need to clarify China's moral role outweighs other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unusual perspective o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also challenges the realist calcul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one couched purely in terms of military balance or economic development.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800 30th Street, Suite 314
Boulder, Colorado 80301

December 1992 / ca. 250 pages

ISBN: 1-55587-350-2 cloth / \$35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原理：變遷中的市場社會主義
文化／石之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五
南，民81
面； 公分． -- （21世紀大中華叢書；5）
ISBN 957-11-0533-3 （平裝）

1. 經濟 - 哲學，原理

550.186

81004092

目 錄

第1章 社會主義政治道德	1
一、前言——兼本書序言	1
二、中共道德政權之隕落	11
三、派系鬥爭本質之變遷	27
第2章 社會主義經濟觀念	53
四、機會成本觀念之變遷	53
五、經濟調控方式之變遷	71
六、社會主義理論之變遷	87
第3章 社會主義市場結構	113
七、商品消費市場之建立	113
八、物資流通機制之建立	134

第4章 社會主義企業文化	159
九、政企關係改革之調查	159
十、市場投資行爲之調查	184
十一、職工認同文化之調查	203
十二、校辦企業實踐之調查	222
第5章 社會主義社會勢力	241
十三、新舊社會勢力之發展	241
十四、道德政權式微之趨勢	248
附錄、傳統反思文獻之分析	253



社會主義政治道德

一、前言——兼本書序言

本書的宗旨，在探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影響而發生的本質變遷。研究大陸政治的學者中，或有認為共產主義政權絲毫未能動搖中國千年來的政治傳統，也有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徹底摧毀了中國固有的政治道德。本書的命題是處於上述兩種主張之間，認為傳統的政治文化先影響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運作的型態，其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又反過來改變了傳統文化的本質。本書認為，傳統的政治文化使社會主義在大陸形成過激的發展，從而改變中國人民對政治本質的認知，此一認知的轉變進一步創造了新的政治行為模式。

在當前研究政治經濟的西方文獻中，鮮有觸及文化因素者。倒是少數研究東亞政經發展的學者，如伯格、杜爾等，曾經注意

到似乎是東亞地區特有的一些條件。●但他們當中亦有如賀芬茲與柯德之學者明確表示，所謂的東亞特色，未必就是文化因素。●無論如何，談及文化者，多數稱頌傳統儒家文化對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這裡所引起的問題，是如何以常態不變的文化因素，去解釋動態常變的經濟現象。此外，如果以中國大陸為例，這種認為儒家文化有助於經濟成長的說法可能更引人猜疑。

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號召力來維繫政權合法性的典型範例，政治領袖以德治天下，透過仁政贏取社會對政權自動地順從。在大多數的其它社會中，傳統道德政權之隕落，多肇因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造成了社會結構多元化，使得政權不得不以更寬容與公開的方式，將政治競爭的過程加以制度化。在中國大陸，這個過程的本末恰好相反：中共的領導人企圖運用道德號召力來動員群眾投入經濟發展的工作，俟經濟成長未能兌現，道德政權之信用隨之受損。

雖然像白魯洵、索羅門、張國森等研究政治文化的學者多數認為既有的中國文化傳統仍可以解釋當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現象，●但一九八〇年以來的變遷的確快速得令文化研究者目不暇給，儘管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喧囂年代也有白魯洵之類的學者能用文化心理需求成功地加以剖析，●但毛澤東這樣的政治人物不復存在了，誰還能滿足同一種文化心理需求呢？事實上，中共領導幹部現在只談實踐而不願高喊革命口號；貪污官倒公然發生；新權威主義者侈談權力而棄德治教化；人民群眾失去對領導幹部的尊重，這些現象真是讓人唏噓，今非昔比的道德政權要如何自處呢？這恐怕不是傳統德治文化中能找到答案的。

在此處所指之文化，係衆人所共享的正義世界觀及用以衡量

個人生命意義的道德倫理標準。觀察中國大陸政經發展的學者必須深思考，應當是傳統中華文化與社會主義兩種世界觀到底能否相容。西方社會科學家迄今並未對此提出有系統地答覆，因為他們向來不慣於以文化角度分析政治經濟問題。然而羅森諾一再辯稱，在當前這種喧囂年代，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之變遷必然要求人們重組認知結構，以能理解眩目的變局並作出調整來適應。

● 此處並不能提出一個可以量化的文化變數，但勿寧仍是以模糊的文化概念為分析的出發點。吾人必先假設，變遷時代的人總得要認清自己在大時代、大環境中扮演的角色方能體認生命之意義。在政治經濟的領域中，這種角色規範的認定與合致是社會合作得以發生之基礎，也是人們坦然接納當前政治結構的條件，否則的話，社會合作將變成耗時廢力，徒然無成的無止盡過程。●

在這種對文化概念的模糊介紹下要了解中國文化勢必引起爭議。當前中共研究領域中的迫切任務，因而不再是剖析中華文化之內涵具體為何，而是要試圖從中華文化中存在的各種世界觀點去看世界，所以是要求透過體會來學習，而不是把文化當成客體來研究，這對一向標榜客觀的西方學術界無疑構成一項有趣的挑戰。

社會主義對中華文化所形成的分裂壓力是如何為西方學術界的先驅所理解的呢？其實西方的中共研究領域從來沒有認為社會主義降臨之前的中華文化必然就是同質和諧的。魏滌寰相信分裂的壓力存在於現代，傳統與革命三種價值體系之間；● 石之瑜的御控模式描述了垂直、平等、反抗世界觀之間的轉換壓力；● 歐格登則相信政治鬥爭乃是反映了文化的，發展的，與政治的三種時代需求之間的衝突；● 范乃思更點出了大陸經濟發展時所同時感

受到來自指令計劃，群眾路線，與市場取向的三種壓力。❶簡單地說，有某種非中國的因子在催促著中華文化發生變遷。

在了解非中國因子的作用之前，吾人勢必得想像何為中國文化因子，學術界有人卻認為，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可以在認知上容忍高度不一致的思想體系而不必感受到必須解決這種不一致的認知壓力，❷所以分辨中國的與非中國的並不見得有意義，然而大多數的文化研究者似乎都相信，將西方世界觀引入中國一定會促成中國人作一些有意識的調整，使他們可自覺有意義地同時適用西方的正義判斷標準與中國特有的文化人生觀。在政治經濟發展這方面，起碼有四種中國特色曾為學者們所討論：父權統治，人情，內在趨力，與國家組合主義。

在歐格登的筆下，父權統治者不是靠專業知識取得統治的合法性，而是靠著他們本當良善的本質與德治教化來維繫政權。父權集團的統治有害於社會主義發展，因為制度化的父權統治使領袖們會假藉社會主義之名，蒐集公共資源來照顧私集團內的成員。中華文化傳統中的劣質因素透過社會主義而更形惡化，從而發生封建式的貪污與後門經濟現象，竟然傳統中最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部分得到了泛濫的契機。❸但傳統與社會主義的這種結合未必造成文化變遷的壓力，因為這種結合消弭了原本社會主義者要以鬥爭來取代傳統的任務。麥迪森就形容在這種結合下產生的地方級領導人物為共產仕紳。他認為共產仕紳在農村崛起正應了父權統治與社會主義的特殊融合需求。這些仕紳一方面繼承傳統德治教化的角色，傳播著新的共產主義道德，另一方面卻又像傳統仕紳一樣地特別照顧自己人。❹

共產仕紳在動員社會成員的過程中遭遇到嚴肅的誘因不足困

難。最根本的因素是社會主義領袖所奠基的階級觀點是以普遍公平與正義為訴求的，而不是像仕紳階級那樣地重用偏袒親屬。所以仕坤式的統治模式傷害了社會主義政權的信用。此外，民衆對於領導人物的觀感，也強化了社會主義政權動員群衆的困難，因為民衆打從心裡不相信領袖代表公平正義。在天朝時代，領袖本不代表正義與公平，而是體恤民衆的君子，故不發生所謂虛矯與信任的問題。社會主義思想沒有改變仕紳式的父權統治，但改變了道德標準，從而摧毀了他們的合法性。其結果使民衆只肯回應於利誘與力脅，此之所以有以實踐為號召的世俗政權出現取代了以革命為號召的道德政權。仕紳藉著社會主義之名行傳統之治，反而奪走了傳統德治之合法性，也限制了社會主義的信用。

中共政治發展的經驗還惡化了的傳統與社會主義結合後所引起的自我矛盾現象。父權統治之極端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個人的地位遠遠超過了社會主義。一旦政治合法性要靠高度個人化與模糊的毛思想來決定時，無異使合法性的標準喪失其客觀性。農民熟悉毛思想者屈指可數，當然只好依自己的理解來扭曲毛思想，目的不過在求自保。麥迪森據此指出，社會主義與傳統道德在客觀正義標準不存的狀況下，同時受到詆毀，使得前此原本雖不完善，但起碼已逐漸共存的兩種世界觀一起瓦解，才會發生文革之後的思想真空。這個現象加速了非道德化的趨勢，也在催促實踐主義者早日取得政治主導。

白魯洵認為實踐主義其實一向是中華文化中的既有因子。但白氏所談的那種實踐主義與新興的實踐主義有質的不同。●過去的實踐主義是費景漢所形容的那種以家庭為核心的功利主義，逐漸向外擴張到宗族，再到國家；而今世的所謂實踐主義卻是個人

化的自我中心式的功利主義。●家族氏的功利主義正是父權統治系統下的邏輯產物，故對於族系成員與非族系成員一向有親疏遠近之分，進而採取可以視為正當的差別待遇。如果要將對自己人的方式延展到對待外人，則外人與行為者之間必先建立某一種人情關係。社會主義思想則反對這種人情關係，但人情關係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卻無所不在。黃光國指出，有計劃地運用人情關係可以策動感情因素，使得外人變成好像自己人一樣，故使得所謂的普遍性，工具性的互動關係轉變成特殊性，互惠性，近乎自己人的互動關係。人情關係的建立有助於使公共的非族系的互動規範和私人的本族系的互動規範有某種銜接共存的機制。●

在文革之後發生的實踐主義是往淡化人情關係的方向在移動，而不是向昇華運用的方向走。日本的企業文化則體現了這種昇華了的人情關係，這在戴國輝等學者的研究中均可證實。●黃光國分析了兩種管理文化的差異。在人情關係為主的管理模式裡，企業會僱用親戚，透過人際關係相互溝通，結合管理權與所有權；但在人情關係以外的管理模式裡，企業僱用外人，以制度化管道進行內部溝通，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在後一種管理模式裡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悸動的政治含意，即人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將父權統治模式習以為常地視為當然，則在政治生活當中，人們當然也會把週遭環境作為生命意義的初始來源，而把國家的父權象徵當成邊際因素。以父權統治與人情關係來動員社會資源便益加不可能了。

這種偏離人情關係的發展可能會動搖了新儒家在古典文獻中所賴以存在的理性基礎。像墨子刻之類的當代新儒家在批判韋伯對儒家的誤解時本是不遺餘力。●韋伯認為中華文化欠缺一種要

征服外在世界的內在趨力。由於現代化要求人們忍受痛苦以能征服自然，似乎與中國哲學一向追求人與自然之和諧格格不入。●新儒家在近若干年仔細透過文獻分析引證東亞的群眾確實具備了韋伯所未能體會的一種內在趨策力。戴鴻超認為，中國人講的是一種感情因素，敦促著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去光耀門楣，榮被祖先。●在日本，這種感情因素影響更大，因為日本的封建傳統使日本人更能接受在同一屋簷下工作的人為自己人。●東亞人的這種群體導向使人們更勤勞，更節儉以便能對所屬團體有所貢獻。

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檢視新儒家這種與自然合一的說法別具意義。社會主義是一種極端重視階級團結的主張，這和新儒家講的一以貫之與不分貴賤的悟道工夫確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墨子刻認為社會主義要成功，仰賴新儒家之處甚多，東亞人為了讓團體接受他，必須證明自己有容忍艱困以能隨時為團體作出犧牲的能力，故與西方工人比來，顯得工作特別勤奮，學習特別努力。潘普就發現一個普通日本技工在技能與知識方面均勝過同級西方工人甚多。●為了讓自己能融於團體，中國人必須剋服自己的慾望，這種挑戰是來自內心世界，也是中國人追求超越的內在困境。故當中國人的社會開始實踐個人化的功利主義時，這種刻服慾望的內在趨力，便會因為大團體的人情關係淡化而漸趨式微。

但墨子刻又認為，社會化大生產給新儒家帶來了另一種希望。如果中國人傳統上想超越趨利的作風而感到壓力，現代化大生產事實上已經可以滿足這種求欲的外在引誘，人與自然之和諧不會受到今世俗塵的利誘而混淆，蓋物質之豐碩已協助人們從外在超越了形成社會競爭失調的根源。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下，新儒家使中國社會較其它社會更能接受社會主義追求階級團結一致的

主張。●

如果吾人從內在世界移往外在世界，從結構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社會，便有如柴格勒者指出中國人行使的政治經濟制度可稱之為國家組合主義，這尤其是以台灣為範例。●林方便提醒學術界，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尤其重視調和個體利益，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儒家平等觀的最高精神也在國家組合主義中獲得具體彰顯，蓋組合主義之領袖有道德義務要照顧眾人的公共利益。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國家組織之範圍幾乎無所不包，正如同典型的組合主義。但在大陸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組合主義裡，利益集團並不活躍，蓋儒家文化裡以自私利益導向的利益集團的論證方式並不具備正當性。

林方也認為社會主義，如同組合主義，可以抑制不良的個人主義，使不致成為惡性的逐利行為而不見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國家可以有意識地引進現代化的價值體系來取代舊有的封建價值。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結合是良是莠不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國家是可以在其中引導，汰蕪存精的機構。故柴格勒似乎相信，由儒家文化支持的國家組合主義其效果最為良好。

總而言之，西方學界對於中華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之互動關係已經有了一些初始之討論。雖然目前尚無普遍接受的定論，但也提出了許多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理論假設。值得來者進一步的發揮。

本書的目的，不在探討中華文化的內容，而是要檢視中華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思潮在政治經濟領域相互影響的機制，故除了內容分析外，尤其著重促成文化變遷的認知轉移，是如何附隨著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而發生，並又如何反作用於繼起的政治經濟

過程。

本書第一章從邏輯上分析，何以中國政治傳統與社會主義體制的結合，會導致政權的非道德化。本章辯稱此一非道德化的過程是永久的，而非僅是歷史循環中的一環而已。第二章到第四章均在演證這個命題。由於社會主義從激化（一九五八年）到改革（一九七八年）只有二十年，時間過短，不足以證實非道德化的過程是永久還是循環的現象，所以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的目的，是透過對改革開放十二年（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一）間的發展，找尋非道德化過程加深加速的證據，以佐本書之命題，即非道德化不是循環的結果，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會重新出現一個道德政權。

第二章從宏觀的角度，討論大陸上經濟觀念的變遷，中央計劃體制之改革與社會主義理論之變化。第三章分析市場概念對政治傳統形成的衝擊。第四章是本書較獨特的貢獻，旨在探討企業文化的形成以及企業認同之發生，並間接演證此一演化對政治傳統的限制作用。本書採用大量的內容分析，與田野訪談資料，希望從大陸學者以及民衆的著作或談話中，找尋他們認為有意義的價值，判斷是非的標準，以及對政府角色的定位。

本書希望在理論上對一般的政治經濟學有所裨益，提醒研究者在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文化心理的關鍵性作用，也希望能在傳統漢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結合方面，作出棉薄的貢獻。

本書若干章節曾在別處以中、英文發表，在研究過程中受到許多鼓勵與批評。這些期刊與學術會議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中共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理論與政策、政大國際關係中心的後鄧小平時期大陸情勢的可能演變討論會、歐洲思想與歐洲心討論會、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年會、中美歐會議、美國東北政治科學學會年

會、漢陽大學中蘇研究季刊等。許多學者曾對本書中之一部分作過評論或協助思辨，他們是黃振聰、古慧雯、范乃思、白魯洵、吳安家、陳思賢、裴宜理、吳玉山、周陽山、明居正。台大心理系的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人員也曾對本研究的構思批判指引。作者在台大開授之中共政治經濟分析，及參與每週一次的中共與大陸事務學會讀書會的所有同學均對作者之思路起過指引作用，其中特別積極，敦促力量最大的是盧瑞卿、張登及、史驪華、宋在薰等學弟。

中國大陸若干匿名的知識分子與企業家協助完成本書第四章之田野訪談，提供了本來他們毋須關切的研究協助，特此表達謝意。本書對這些能夠自覺自勵的企業家有很高的評價，也在此預祝他們成爲市場與計劃結合的典範。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初稿完成後，經過了半年的謹慎審核，決定對本書之印行提供全額出版獎助，在此一併致謝。

曲曲與一華在每晚天倫時刻必須忍受作者埋案尋牘，他們才是本書得以完成的真正功臣。樂樂將在本書付梓刊行之際加入我們，這本書算是我們給他來到人世的獻禮。

